

东亚的国家有机体学说  
明治时期日本的国家观与朝鲜的“社会政治生命体”论  
姜 海日 (JIANG Hairi) \*

国家有机体学说是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生物）的学说。这种学说源自古希腊的一种思考方式。特别是在十二世纪的西欧，这种学变得日趋精致：将君主视作头脑，将内部的各个阶层视为内脏以及四肢等人体的各个部位。通过这种隐喻，唤起各阶层之间的有机集合以及共同体的单一性。<sup>1</sup>

将国家视为一种生物，并将其内部的各个部分机械性地比作身体各个部分的看法，随着十八世纪西欧传统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瓦解，逐渐发生了变化。“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并没有将君主视作一种外在的超然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国家内部的一种机关来看待，并将其纳入国家内部，与国民一同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并将‘神的意志’这一单一的精神作为唯一约束国家的国家论。”<sup>2</sup>

换言之，国家自身并不是一种将专制君主作为头脑的生物，而是以单一的国家精神作为其内在的核心。君主相对于国民的绝对权威被剥夺，为确立近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在亚洲，率先完成国家近代化的日本，也输入了这样一种理论。德国的国家有机体学说随着加藤弘之在一八七五年翻译出版布伦奇利的《国家泛论》而得到认识。但当时这种舶来的国家观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完全正确的理解。

刚刚完成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建设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将这种‘以超越君主与国家的单一国家精神’作为顶点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被理解成了主权在天皇的，国家是一种将天皇作为最高头脑的生物。国家有机体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对国家内部结构的一种思考方式，而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理论却被用作强化天皇的权力。

这种理解方式当然是对十九世纪德国有机体国家学说的误读，这种理解更近似于十二世纪西欧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如果从布伦奇利以及之后的施泰因所论述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来看，这种理论绝对不可能保障天皇的绝对权威，而只会将天皇视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也就是说，即使天皇在国家有机体学说的结构中位于‘头部’，国家精神也只不过是这里作为自己栖身的场所，而‘头脑’这种器官本身并不是国家精神产生的源头，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并不会为天皇所有。一九一二年，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中提出了天皇机关学说，而上杉慎吉以天皇族父学说进行了回击。

在天皇族父学说中，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肇国之神的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世代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日本的所有国民，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皇室是嫡系，而普通国民则是旁支。日本是以天皇作为族父的家族国家，国民对天皇尽忠尽孝成为了一种应有的伦理。这种关系与儒家学说中的家族伦理毫无抵触。在中国的儒教伦理中，对父亲的孝与对帝王的忠可以说是直接相连的。

虽然亲身聆听过施泰因课程的伊藤博文以及海江田信义，将德国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中的‘人格’概念错误理解为‘人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国家有机体学说，有意被视

---

\* 京都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

<sup>1</sup> 嘉户一将“作为身体的国家—明治宪法体制与国家有机体论” p9

<sup>2</sup> 前文，p10

为支持国家的统一性以及容纳单一精神的理论，则明治时期的宪法体制则需要创造出领导这一精神的头脑，天皇就是这一头脑的不二选择，而这种可能也是不可否认的。<sup>3</sup>

而另一方面，朝鲜的“社会政治生命体”论这一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完成时间则很晚。今天，将主体思想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朝鲜建立于一九四八年，建国初期，金日成虽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但其一人支配体制的最终完成，则是要等到一九五六年以后，一九八零年，金日成长子金正日对其父亲权力的继承正式浮出水面，而这种世袭的统治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金日成从朝鲜半岛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九四五年之前，就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而这也成为其权力正当性的最大砝码。而由他创立的主题思想这是一种结合了马列主义与朝鲜民族主义的理论。金日成垄断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并持续加强和正当化自身的统治。

铃木昌之将这种朝鲜独特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义为“领袖制”<sup>4</sup>，并将支持这一制度的两大理论视作革命领袖观与社会政治生命体论。革命领袖观可概括为：领袖创造了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使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奋力开展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领袖揭示了正确的战略与战术，将开展改造自然与社会事业的人民大众引向胜利，领袖是人民大众团结的核心，指导的中枢，而且领袖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与诉求的代表，崇高的道德与信义的体现者。对革命家来说，忠于领袖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体现。<sup>5</sup>

而另一理论则是社会政治生命体论。其内容为：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以领袖为中心，在思想和组织上团结一致，形成了拥有不灭的自主生命的社会政治生命体。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虽然有限，但团结为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体时，则会拥有不灭的生命。首领是脑髓，党是血管和神经，人民大众则各自发挥细胞的作用，并会永远地生存下去。领袖是给予人民大众政治生命的亲生父母，而人民大众则应当牺牲小我，对领袖尽忠尽孝。<sup>6</sup>

从革命领袖观我们可以知道，领袖相较于普通的民众，几乎是一钟全知全能的存在，其权力更是无可比拟。所谓的革命斗争，其实就是在民众在领袖的指示下，完成领袖的构想的过程。人民大众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对领袖尽忠就是在这样的理论下得到保障的。

在社会政治生命体正式提出之前，朝鲜就已经将领袖对人民的爱比作“父亲一般”的爱。而这种关系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将抗日游击战争时期领导者金日成与其游击队员关系扩大到了全体国民。将首领视作父亲的目的，自然是要将儒教伦理中的孝道作为一种政治支配的手段。而为了在毫无血缘关系的民众与领袖之间正当化这一孝道理论，只能创造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并且规定了领袖赋予的“社会政治生命”高于普通的肉体生命。换言之，对领袖的孝优先于对父母的孝。领袖与民众之间成为父子关系，而整个朝鲜也就随之成为了所谓的“革命大家庭”

领袖通过人民的忠诚与孝道，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凌驾于国民之上。但其理论其实暗含着一种矛盾。那便是在社会政治生命体中，首领既是赋予人民大众不灭的社会政治生命的“父母”，而同时在生命体内部处于脑髓的地位。这可以理解为机械性地将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威整合到领袖时产生的一种矛盾。

金日成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归根结底来源于抗日游击战争，但从历史上来说，拥

<sup>3</sup> 嘉户一将“作为身体的国家—明治国家宪法体制与国家有机体论” p15

<sup>4</sup> 铃木昌之“朝鲜的政治体制与冷战—以领袖制国家中忠诚的形成与溶解为中心” 26

<sup>5</sup> 金正日“关于在活动家中牢固树立主体革命观”。原文为朝鲜语，引用部分由笔者翻译。

<sup>6</sup> 金正日“关于在主体思想教养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原文为朝鲜语，引用部分由笔者翻译。

有儒家传统的朝鲜半岛在二十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随着朝鲜半岛的解放，半岛北部在苏联的支持下成为了共产主义国家。而领导人金正日的抗日活动在此之前几乎都是在朝鲜半岛外部进行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在社会政治生命体提出之后，在朝鲜大规模开展了对其革命传统的捏造活动。而这一举动也可以理解为是领袖正在通过成为“民族的父亲”树立自己的权威。

与此相比较，明治时期的天皇其自身的权威通过历史得到了彻底的保障，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权力纳入自己的掌中。明治时期，将德国的“有机体国家论”中提到的“人格”概念理解为“人体”，并将天皇定位为头脑，可以说是对其权力进行集中强化的必然过程。通过确定这种关系，权威与权力全部集中到了天皇一人手中。如果说领袖通过社会政治生命体理论，在绝对权力的基础上整合了权威，那么天皇对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论”的复古性的理解，则可以视作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对权力进行了整合。

#### 参考文献

文部省编纂. 国体之本义[M]. 东京. 1937

古田博司. 朝鲜的儒教传统与主体思想的展开-以金正日“七·一五谈话”为中心[J]. 下关市立大学论集. 1991. 34 (3):29-70

铎木昌之. 朝鲜的政治体制与冷战-以首领制国家忠诚的形成与溶解为中心[J]. 新防卫论集. 1997. 25(1):24-40

古田博司. 天皇与首领-隐藏在东亚有机体论下的暗流[J]. 大航海. 2003. 45 : 143-149

嘉户一将. 作为身体的国家-明治宪法体制与国家有机体学说[J]. 相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年报. 2010. 4:9-20

金正日. 关于在活动家中牢固树立主体革命观[EB/OL]. [http://www.ournation-school.com/contents/library/lb03/library\\_lb03\\_2271/97.htm](http://www.ournation-school.com/contents/library/lb03/library_lb03_2271/97.htm). 2016-01-09

金正日. 关于主体思想教养中提出的若干问题 [EB/OL]. [http://www.ournation-school.com/contents/library/lb03/library\\_lb03\\_2230/2009-07-30htm](http://www.ournation-school.com/contents/library/lb03/library_lb03_2230/2009-07-30htm). 2016-01-09